

重读李鸿章

牛贯杰 著



重
读
李
鸿
章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K827
2135

重读李鸿章

牛贯杰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目 录

引言	001
第一章 李鸿章的陆军部队——淮军	015
第二章 李鸿章的北洋海军	047
第三章 治器与治器之器	089
第四章 李鸿章与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103
第五章 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的电报业	117
第六章 『开矿救国』——李鸿章与新式矿业	129

第七章 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

153

第八章 修建铁路一波三折

169

第九章 李鸿章的外交生涯

195

尾声 李鸿章之死

21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读李鸿章 / 牛贯杰 著 .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 2014.5

ISBN 978-7-5060-7504-6

I. ①重… II. ①牛… III. ①李鸿章 (1823 ~ 1901) — 人物研究
IV. ①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5988 号

重读李鸿章

(CHONGDU LIHONGZHANG)

作 者 : 牛贯杰

责任编辑 : 邓 翊 戴燕白

出 版 :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 100706

印 刷 :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30 毫米 × 950 毫米 1/16

印 张 : 14.5

字 数 : 116 千字

书 号 : ISBN 978-7-5060-7504-6

定 价 : 32.00 元

发行电话 :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 请拨打电话 : (010) 64258029

引言

大家都知道，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社会思潮风雷激荡，各种政治角色粉墨登场，为中国历史上又一社会转型期。即使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恐怕也未有此一时代纷繁复杂。这一时代呼唤的主题，一言以蔽之，乃“富”“强”两端。李鸿章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一生事业亦基于此。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一个政治人物，能在近四十年的政治漩涡中始终屹立不倒，着实不易。李鸿章却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做到了。作为政坛“常青树”，李鸿章以“做人更做事”的风格著称于世。然后世对李鸿章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

毁者云其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不思进取，丧权辱国；誉者则曰他尽心竭力，为民担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李鸿章以传统文人之典范——进士身份，转战南北，统帅淮军，总制北洋，内则参与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外则身担中外交涉重任，历三十年之久，其目光之远大、心胸之开阔，当时无疑首屈一指。他的老师曾国藩称其“才大心细，劲气内敛”。细考之，“才大心细”或有过誉之词，然“劲气内敛”却当之无愧，中肯贴切。纵观李鸿章一生，其成功秘诀在于“忠”“忍”二字。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东乡人。他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农历正月初五，这天正是民间“迎财神”的日子，故少有“小财神”之称。

李鸿章的家世并不显赫，是典型的庄户人家。《李鸿章家书》记载道：“前吾祖父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如过江之鲫。”其祖父李殿华曾两次参加“乡试”，但均未考中举人。其父李文安，自幼读书勤奋，三十五岁得中举人，年近四十时高中进士，由此奠定李家“始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之基础。李文安自号愚荃，为人“刚方厚重”“事亲至孝”，对子女影响颇深，造就出“一门两代三进士”的辉煌家景，即李文安自己、长子李瀚章和次子李鸿

章。李鸿章的母亲也姓李，为合肥名士李腾霄之女。李夫人出身书香门第，“秉性淑慎，教子义方”。她经常教导儿子“致事报国”，女儿勤俭持家。李氏兄弟发达后，母亲亦“时时以盈满为诫”。李鸿章本名章铜，父亲后改名鸿章，意在希望其成人后能“鸿图大展，文章经国”。李鸿章亦没有辜负父亲的殷殷期望，二十一岁考中举人，二十四岁中了进士，成为当时安徽最年轻的翰林。

李鸿章先后有三房妻室。原配周氏，是李鸿章启蒙老师周菊初的侄孙女，比李鸿章大两岁。两人在李鸿章进京赶考前完婚。李考中进士后，两人天各一方，鸿雁传书。李鸿章在京赴职，周氏则待在老家。1861年，周氏病故于南昌湘军大营。李鸿章的继室夫人是赵小莲。赵小莲家世显赫，四代人均有高中进士者。祖父赵文楷是嘉庆元年的状元，曾任册封琉球国王正使。父亲赵昀是道光朝进士，做过咸丰帝的陪读。哥哥赵继元为同治朝进士，侄子赵曾重是光绪朝进士。周氏夫人病故后一年，李鸿章实授江苏巡抚，不久与二十四岁的赵小莲结为伉俪。此外，李鸿章五十岁时还纳一比他小三十余岁的莫姓女子为妾。赵小莲死后，莫氏扶正，被诰封为一品夫人。

李鸿章兄弟共有六人，他排行第二。大哥李瀚

章，拔贡出身，因理财能力突出，被曾国藩提拔负责湘军粮台事务，渐至湖广总督、两广总督等职。李瀚章初创淮军时，李瀚章为其在香港代购洋枪三千支。李鸿章北上“剿捻”及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时，李瀚章又多方为他筹措军饷。可说乃二弟最重要之政治奥援。三弟李鹤章，才智平庸，“屡试不第，遂弃举业”。李鹤章自己虽仕途上不得志，但他的三子李经羲却成为清末民初政坛上的翘楚人物。辛亥革命时，李经羲时任云贵总督。民国初年，李经羲、徐世昌、赵尔巽、张謇四人成为清朝遗老的代表，时称“嵩山四友”；“府院之争”时曾任国务总理。李经羲的曾孙李道豫，曾任中国政府驻美大使。四弟李蕴章，因单眼失明一直留在家乡。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蕴章主持撰成《续修庐州府志》，计有正编一百卷，补遗一卷。五弟李凤章在兄长强大政治势力的保护伞下，主营土地、典当等生意，兼放高利贷，成为芜湖首富。六弟李昭庆比李鸿章小十二岁，自幼聪颖过人，“少通经史，博学能文，持躬端正”。曾国藩督师“剿捻”时，曾对李鸿章道：“捻匪非淮勇不能剿灭，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因此曾国藩特意提拔李昭庆，令其负责济南运河防务。然李昭庆不堪军旅之苦，竟私自溜回家去。李昭庆仕途不畅，

三十九岁便郁郁而终。

李鸿章起家的机遇源自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农民起义，尤其是后者。太平天国政权败亡后，众多余部北上参加捻军，同治年间势力遍布中原，成为当时清廷最主要的敌人。湘军首领曾国藩独臂难撑，“剿捻”不利。清廷决定起用李鸿章为“剿捻”主帅。李鸿章本为江苏战场镇压太平军的主帅，江苏为太平天国心腹地带，因此战事尤其激烈。李鸿章率军与太平军鏖战数载，常有败绩，使得镇压太平天国之首功不但没落在李鸿章头上，反屡遭革职。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李鸿章始终进退如常，这可谓其成功之基础。

光绪初年，中英关系骤然紧张。云南发生英国传教士马嘉里被杀事件，英国公使威妥玛下半旗后离开北京，双方战事一触即发，情势危急。清廷内部意见纷纷，乱作一团。关键时刻，清廷又记起了李鸿章。李鸿章果然不辱使命，与洋人谈笑周旋间，战火灰飞烟灭。

中日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事业的转折期。甲午一战，中国溃败，激起千层巨浪。时人印象里，西洋之强大已是人所共知，但隔海相望的东洋日本却是蕞尔小国，未成气候。甲午战败，举国震惊，民怨沸腾。国人将愤怒之矛指向统治当局。从一定意义上讲，当

时清廷的代言人就是李鸿章。李鸿章遂成为历史的替罪羊。当时李鸿章已是七十三岁的高龄，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压力可想而知。李鸿章于内遭受着国人白眼与谴责，于外还得收拾残局，处理善后事宜。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李鸿章东渡扶桑后，在日本马关又遭当地激进分子刺杀，面部挨了一枪。身心交瘁，李鸿章依然坚持与日方从容交涉，难能可贵。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代表清廷到俄国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仪式。接着转道访问欧美各国，为世界真正了解和尊重中国而奔忙游走。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中国形成一道强劲冲击波，将洋人和洋教卷了个天翻地覆。洋人对清政府的骑墙态度深为不满，决意进行报复。英、法、德、意、奥等八个国家最终联合起来，给清政府以最沉重的打击。清朝国运衰微，李鸿章再次临危受命，与联军进行谈判。因心力交瘁，李鸿章倒在同俄国人的谈判桌上。他的一生，可谓对清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人物。作为政治家，他在各个方面都遭到了惨败。军事上，由于任人不当，没有依靠专家治军，尤其甲午一战，二十余年之苦力经营付诸东流；洋务上，因难以作出实质性改

变，企业终未获得独立性而听命于官僚；外交上，由于昧于世界大势，频频被洋人所欺。

人们喜欢将中国和日本进行比较，将洋务自强时代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相提并论。二者孰优孰劣，仅从练兵一项比较就伯仲分明。李氏练兵，时间上先于日本，花费上却大大超过日本。双方甫一交锋，中方即溃不成军。同治以来的几十年间，清廷派遣了大量海陆军留学生，但从未有一人回国后担任要职，惟独信赖李之亲属及其淮军部将。于是诸如叶志超、卫汝贵等平庸之流，都能占据要缺。依靠这样的将领如何抵御强敌？

李鸿章洋务上的作为可分四类：一是交通，如电报、铁路、轮船招商局等；二是矿业，如漠河金矿、开平煤矿等；三是民用工业，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四是商业，如李鸿章积极组织公司同洋人通商等。洋务惨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类企业往往受到官方的严重制约，到处安插私人，不求引进专门性人才，亦不讲求生产效率的提高与技术设备的改进。总体来说，赚钱的少，赔钱的多。

李鸿章外交手腕的核心是以夷制夷，辅之以息事宁人的原则。中法之战，李鸿章希冀利用英、德以制法；中日之战，又打算利用俄、英以制日；德国强占

胶州湾时，李又希望利用英、法以制德；这样做，实际上不但没收到任何成效，反使自己频频受骗。至于晚年主张联俄，更是引狼入室。

李鸿章并不属于彼得大帝、拿破仑、俾斯麦那种改变历史进程的英雄人物，就才能而论，“才堪中上”，得益于时代机遇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关键人物。李鸿章上受制于腐败的帝国体制，中受制于保守顽固的同僚，下受制于民气不开的国人，辗转周旋于不幸时代，移祸避衅，使清朝得以苟延残喘数十载。李鸿章生活的时代，值皇帝庸懦而太后专权，国运衰微，他能够孤心把持大局，为国鞠躬尽瘁，功不可没。梁启超评论李鸿章云：“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所长。”也就是说，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指近代知识，对世界大势的把握等），有阅历而无血性，虽有挽狂澜于既倒之心，但苟且偷安，并未立百年大计于后世。这种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纵观李鸿章一生，他是个失败者。他并未使中国走向富裕与强大，甚至临死时也没见到独立自主的中国。梁启超对此做了精确的总结：“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已于大局先自不明。日

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已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笑百步也。”细细体味梁氏所说的李鸿章之不足，其实是当时的中国人普遍面临的困顿迷茫。李鸿章个人亦无法逃脱时代套在他思想上的枷锁。正是这剪不断、理还乱的诸种矛盾交织困扰，构成了近代中国人的特殊心态，李氏一生莫不如此。

至于梁氏所云：“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之所以富强之源，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惟枪尔！炮尔！铁路尔！机器尔！”这番话显然是对李鸿章的误解。李鸿章何尝不明白“民为水，君为舟”的道理。他屡次强调政治制度为百务之先。李鸿章的悲剧亦是时代的悲剧，尽管他认识到人民乃立国之根本，在具体办理洋务时却根本行不通。想要百废俱兴，谈何容易，如派遣留学生一事。光绪三年（1877年），驻英大使郭嵩焘写信给李鸿章，提及邻国日本向英国输送的留学生，大约有一百来人，学习科目多为法律、政治之类，很少有人专攻军事。他告诉李鸿章不要追求短期利益，希望速致富强，而应循序渐进，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李鸿章看信后，长叹道：“筠仙（按：指

郭嵩焘)不知道我的难处呀!”当时西方政治法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根本不值一提,如果说科学技术真正见识过,不服不行,那么政教风俗等国之根本则万万不可动摇。即使从军事入手,留学生的派遣仍遇到各方阻力,李鸿章力排众议才促成此事。当时大部分士子沉浸于蝇头小楷的微言大义中,认为西学乃奇技淫巧,政治制度更是洪水猛兽。李鸿章只能服从现实,在旧的体制下推行求强求富。

总理衙门是清季推行洋务的中枢机构。但它没有掌控财权,真正决定财权的是各地督抚大员。哪里该修筑铁路,哪里应铺设电线,哪里能设立工厂,都需当地官员许可并鼎力支持才可兴办,并没有一个整体发展的计划和目标。新式企业大都为官督商办,缺乏独立自主性,代之以腐败的官僚作风。这些企业在实际生产中往往受到官员多方制约,专业人才得不到重用。企业又往往过分依赖洋人,许多重要工程都交给洋人去办。这些洋员大多没有什么真实本领,本国很难混到饭吃,冲着中方的高额薪金才来投奔,他们想尽各种办法以求留任,阻碍了中国自己的专业人才得以大显身手。从轮船招商局可以看到官督商办企业的种种弊端:船的样式长期得不到更新,渐趋陈旧;所雇用的人数是外国同行太古、怡和公司三倍以上,每

艘船都挂着亲朋好友的名分二三十人；局董们以权谋私，装运私货；码头停靠开船，没有任何时间限制，混乱异常；购料等事由洋人掌管，真正的工作人员，像船长、大副、二副一般都由外国人担任，他们往往串通共牟私利；洋员工资比在日本时高出两三倍，对烧煤等浪费毫不在意，责任心极差，平时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迎来送往、打点官差上。

近代的洋务买办，很多是在科场上败下阵来，文化素质其实并不高。这些人久居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耳濡目染，通过翻看外国书籍等途径接触到一些国外事物，正途发迹无门，于是靠举办洋务以求功名利禄。当然其中不乏有真才实学之人，但往往得不到重用，如郭嵩焘、容闳。以上海制造局为例。上海制造局总办一职月薪规定仅有百元，因薪金太低造成贪污而屡屡换人，后增至白银一千二百两。工资涨了，贪污风气却一点没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议价处是制造局中最肥的差事。湖南人王钦谔，于该处混迹数十年，后虽因劣迹被开除离局，却已成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富翁。总办魏蕃室，上奏请求购买料物采用西方的招标法：谁更物优价廉就同谁合作。这一建议得到了皇帝的嘉奖。然事实却表明：这纯粹是魏蕃室掩人耳目、沽名钓誉之举。他暗地已指定两家公司，虽

每次都经投标工序，但早派人通风报信，所以每次中标的都是这两家公司。制造局用煤都来自宁波叶氏义昌成记，双方签订了长期合同。然而在码头装卸煤时，查验人员懒得验磅，这道工序渐渐形同虚设。至于小工经常偷盗煤料，工人日常懒散，工程师帮别的公司做活，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历届总办都没有狠抓管理，把工作当回事。认真负责的工头不给予奖励，而怠工误工的也不进行惩罚，赏罚不分，职责不明，升迁时又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完全凭着自己的主观喜好，这导致了官员和工人们毫无积极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正是各种社会现实制约着李鸿章的洋务脚步。李鸿章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总结失败原因时说道：“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变法，但都没想到要变法就得首先有变法之人，所以首先是要培养人才。不仅是我一个人在朝中呼吁推行洋务，许多大臣比我还要积极，但落实到行动上有着许多意想不到的节外生枝之处。我详细调查过许多官员，他们往往对各项洋务措施虚与委蛇，应付一下了事，如果这种作风不改的话，恐怕中国很难振兴。十几年来，文臣声色犬马，武将纸醉金迷，造成今日之奇耻大辱。平日里我多次讲过要加强武备，而各位官员以塞满腰包、铺张浪费